

# 芬蘭化·蘇聯對西歐的戰略設計

10:4  
(22 68:4)

趙春山

##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納粹德國的潰敗，蘇聯佔領了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東德。蘇聯不僅扶植這些國家中的親蘇共黨上臺，並將史大林式的極權統治型態，強行於這些國家。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當時邱吉爾以在野之身，曾在美國費爾登 (Fulton) 發表演說稱：「蘇聯在歐洲大陸上，從波羅的海的史特丁起，到亞特利海的底里斯特 (Trieste) 止，拉上了一張鐵幕。」<sup>①</sup>蘇聯戰後將東歐關進「鐵幕」，可以說是歐洲政治舞臺上的一幕歷史悲劇。

戰後蘇聯與東歐的關係，雖然因為克里姆林宮領導階層的更迭，以及東歐內部民族主義造成的自由傾向，而產生若干改變<sup>②</sup>。但基本上，蘇聯仍在東歐地區具有獨佔性的影響力，任何外來勢力皆無法與蘇聯在東歐扮演的角色相互抗衡。

蘇聯控制東歐的工具，基本上可以歸納為下列三方面來討論：

(1) 以「經濟互助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MEA 以下簡稱「經互會」) 作為蘇聯強化與東歐經濟關係的紐帶。「經互會」成立於一九四九年，最初是蘇聯用來對抗美國「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 的一個宣傳工具。史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即企圖透過「經互會」，促使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整合，並希望擴大到共黨世界的經濟聯合。實際上，蘇聯與東歐在經濟上具有相互依存關係，東歐特別依賴蘇聯的原料與能源供應。蘇聯以低價供應東歐石油，目的就是略施小惠，爭取向心力。

① 雷松生、國際關係，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二年八月，頁一九二。

② 戰後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基本上可以以史大林統治時期作為分野。史大林控制東歐的方法是使這些東歐共黨領導階層，普遍接受他的「神聖魅力」(mystique of his own Omniscience)，並以蘇聯滲透當地的秘密警察或是蘇聯在當地的駐軍，作為配合控制的工具。在史大林時期，蘇聯和東歐之間可以用「帝國」和「附庸」的關係加以形容。史大林死後，儘管蘇聯仍是支配東歐的最具實力國家，但雙方關係已不再具有「附庸」的性質，蘇聯與東歐處於「談判」(negotiation) 的狀態，蘇聯以其實力來與東歐談判，但蘇聯必須常常接受妥協。在東歐任何地區，蘇聯都不再具有發號施令的地位。Stephen S. Anderson, "Soviet Relations with East Europe," *Current History*, Vol. 51, No. 302, October, 1966, P. 200

(2) 透過「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華約組織」)，蘇聯得以控制東歐共黨政權。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蘇聯與東歐國家成立的這個組織，表面上是針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北約組織」，以及西德的再武裝威脅而發，實際上，蘇聯已經由此一組織，使蘇聯戰後在東歐的駐軍<sup>③</sup>，獲致「合法化」的解釋。這些駐軍是蘇聯駐在當地的「警察」，在對付東歐的「反叛」，以及懲罰未經蘇聯領袖核可的任何東歐國家政策改變方面，會發揮很大的功能<sup>④</sup>。

(3) 無論東歐的自主趨向如何，它們與蘇聯是以共同的共黨意識形態為基礎的。蘇聯不僅利用意識形態作為其與東歐聯繫的橋樑，必要時，蘇聯也以意識形態作為干預東歐內政的藉口。一九六八年蘇聯侵犯捷克的理論根據即是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蘇聯領袖認為，為了維護社會主義，蘇蘇有權干涉社會主義世界中任何地區的事務。

蘇聯戰後雖在東歐取得支配地位，但克里姆林宮的領導階層並未因此感到滿足。根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蘇聯希望西歐國家亦能迅速的「蘇維埃化」。但是，蘇聯的戰略目標却因東西雙方在歐洲地區的冷戰對峙，以及西歐戰後在政治與經濟方面發展出一套與東歐全然不同的體系，而受到阻遏。為了在西歐從事共產主義運動，蘇聯領袖即根據西歐主觀與客觀的環境，擬議一套戰略設計。此戰略設計是以蘇聯與芬蘭的關係作為模式，也就是本文所欲探討的所謂「芬蘭化」(Finlandisation) 概念。蘇聯在西歐從事「芬蘭化」的目的，主要是企圖不經由武力，而獲取支配西歐的地位。

## 貳、戰後西歐政治情勢

### 一、美國介入西歐事務——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本欲恢復其傳統的「孤立主義」態度，將歐洲的事務交由英國去處理。但是英國經戰火的摧殘，實力大為受損，無法擔負此重責大任。當蘇聯的勢力席捲東歐，而土耳其與希臘在蘇聯侵略威脅下岌岌可危時，美國杜魯門

③ 蘇聯目前在東歐的駐軍，主要包括以波蘭列格尼加 (Legnica) 為指揮部的北方兵團 (Northern Group)；以匈牙利圖庫爾 (Tokod) 為指揮部的南方兵團 (Southern Group)；以捷克米羅維斯 (Milovice) 為指揮部的中部兵團 (Central Group)；以及靠近東柏林，以朱森——烏生多夫 (Zossen-Wunsdorf) 為指揮部的蘇聯東德兵團 (The Group of Soviet Forces in East Germany)。Richard F. Starr, "Soviet Relations With East Europe", *Current History* Vol. 74, No. 436, April, 1978, p. 145

④ 最明顯的例子是，蘇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率華沙組織四個部隊佔領捷克，壓制捷克的「自由化」運動。

(Harry S. Truman) 總統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國會發表演說，要求撥款四億美元援助希臘與土耳其，杜魯門在演說中強調以下幾點：

- (1) 認為美國的政策應為協助自由人民，抵抗國內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的陰謀顛覆；
- (2) 認為美國應協助自由人民以其自己的方式，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 (3) 認為美國的協助，應透過經濟與財政的援助進行，此對經濟穩定與政治過程的秩序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 (4) 美國不允許透過強制或是政治滲透的口實等破壞聯合國憲章的方式，促使現狀的改變；在協助自由與獨立國家維護其本身自由方面，聯合國應使憲章原則付諸有效；

- (5) 如果美國未能在此緊要關頭援助希臘與土耳其，則其影響將遠及西方與東方；
- (6) 要求國會授權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這段期間，援助土、希四億美元。其中三億五千萬美元用來援助希臘，作為早先所提，供給那些飽經戰亂國家用來防止饑餓等問題；

(7) 要求國會授權政府派遣美國平民及軍事人員到土、希兩國，協助它們重建及監督它們使用美援物資及資金<sup>⑥</sup>。

杜魯門在國會提出援助土希兩國案後，兩黨議員皆起立歡呼表示支持，此代表美國對歐洲將採積極的態度。杜魯門總統所提的呼籲，一般稱之為杜魯門主義 (Truman Doctrine)，其實施的結果，使希臘與土耳其免於受到蘇聯的控制。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 (George Marshall) 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說明美國經濟援助歐洲各國的決心。馬歇爾在演講中，首先說明美國政策的宗旨。因為，若干批評杜魯門主義的國內外人士，對於杜魯門強調美國在戰略及意識型態方面與蘇聯的對抗立場，表示不以為然。針對這些批評，馬歇爾認為：

- (1) 美國的政策並不針對任何國家或思想，而是要對付饑餓、貧窮、自暴自棄與混亂，美國政策的目標是促使世界經濟的持續復原，以提供一個自由制度能够存在的政治與社會條件。
- (2) 當各種危機發展時，美國的援助將不以片斷作為基礎。美國未來提供的任何援助將是提供「治療」，而非僅為「緩和」。
- (3) 任何政府願意在此復興的工作中提供援助，將獲得美國的充分合作。任何政府如企圖阻止其他國家的復興努力，將不會獲得美國的協助。此外，任何政府、政黨或團體，為了求取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而企圖置人類悲慘境遇於不顧，將遭到美國的反對<sup>⑦</sup>。

<sup>⑥</sup>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9), pp. 222-223.

<sup>⑦</sup> *Ibid.*, p. 233

涉及歐洲的復興方面，馬歇爾在演講中講中進一步強調了下列幾點：

(1) 在美國政府努力緩和歐洲困境及協助歐洲開始其復興之路以前，歐洲國家必須針對其需要以及他們在此計劃中從事的工作，先行達成協議。

(2) 由美國政府片面制定計劃，置歐洲於經濟自立的基礎，自屬不适宜；這是歐洲人的事；應由歐洲人採取主動。

(3) 這項計劃必須是由多數歐洲國家達成的共同協議。

(4) 美國扮演的角色是協助起草一個歐洲計劃，隨後支持這樣一個計劃使我們做起來切合實際<sup>②</sup>。

馬歇爾的演講發表之後，英國外相貝文 (Ernest Bevin)、法國外交部長皮杜 (Georges Bidault) 立刻在巴黎集會，並邀請蘇聯外長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olotov) 參加。會中由於莫洛托夫拒絕接受英法提出的計劃，並聲稱美國的經濟援助危害受援國主權，而使這項會議宣告破裂。七月三日，貝文及皮杜發表聯合公報，邀請二十二個歐洲國家派遣代表到巴黎，共同商討歐洲復興計劃。其中捷克最初本同意參加，但當其總理及外長訪問莫斯科後，立刻在蘇聯壓力下改變立場<sup>③</sup>。

在巴黎會議中，歐洲國家所提的歐洲經濟復興計劃，約需兩百億美元，歐洲國家希望美國援助一百九十三億三千萬美元，即一般人所稱之「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自一九四八年四月起至一九五一年年底止，共計實施了四十五個月。它的經濟援助不但包括了參加巴黎會議的十六個歐洲國家（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愛爾蘭、挪威、瑞典、丹麥、冰島、瑞士、義大利、奧地利、葡萄牙、希臘、土耳其），並且廣及西德與其他各洲國家。美國共計用去一百二十億美元。英國獲得二十八億美元，法國獲得二十三億美元，西德與義大利各獲得十三億美元，荷蘭獲得十億美元。亞洲諸國獲得的總額，不及十億美元<sup>④</sup>。

馬歇爾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歐洲戰後因受戰爭影響百廢待興的局面而發。貧窮與落後乃是共產主義滋生的溫床。馬歇爾計劃實施的結果，使西歐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中復原起來，並有效地杜絕了共黨趁機向西歐滲透顛覆的良好機會。

無論是杜魯門主義，或是馬歇爾計劃，此皆代表美國戰後對歐洲採取的積極態度，即以實際行動對抗蘇聯在東歐以外的其他歐洲地區的擴張陰謀。在闡明美國上述積極政策時，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肯楠 (George F. Kennan) 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外交事務季刊 (Foreign Affairs) 以「X」的筆名，發表了「蘇維埃行動的來源」(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一文，強調：蘇維埃政權有其內在的矛盾，它必須向外發展，方可解決困難。西方國家應採取的對策是把蘇聯力量限制於其現有的範圍內。如蘇聯有侵略自由國家的徵兆時，立即使它面臨一個強烈的對抗力量。西方國家自身應修明政治，健全社會組織，從事經濟發展，提高

② Ibid., p. 234

③ Ibid., pp. 234-235

④ 雷松生，國際關係，前引書，頁一九四—一九五。

人民精神的及物質的生活，採取此種長期而堅定的政策，使蘇聯無從向外發展，可以助長蘇維埃政權內在的矛盾，其結果可促使蘇維埃權力分裂或軟化。一般人稱此項政策為圍堵政策 (Policy of Containment) ⑥。

除了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畫以外，圍堵政策的具體實施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⑦。美國之成為北約組織的一員，其最重要的意義是改變了美國對世界事務的態度。自從華盛頓發表「告別演說」(Farewell Address) 及「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 時代以來，對歐洲的權力平衡政治採取不干預的原則，一直深植於美國人的心中。儘管美國兩度參預起源在歐洲的大戰，但除非出現公開的侵略行動，美國輿論不可能支持政府介入長期的海外軍事承諾。因此，美國輿論之支持政府加入北約組織顯示：美國已視防衛西歐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將歐洲的自由與北美的自由緊密地聯繫一起。美國對外政策的此一重大改變，基於美國的一項了解，即認定整個歐洲地區「蘇維埃化」後，可能會造成下列惡果：

- (1) 毒害到西方文化的源泉。
  - (2) 危及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地自由政治制度的存在。
  - (3) 使歐洲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基地及影響地區，易於受到共黨的顛覆。
  - (4) 將西歐日增的生產潛力置於蘇聯侵略政策的支配之下。
  - (5) 使蘇聯得以阻擋美國陸海空軍力量進入大西洋東岸的通路，而減低美國的縱深防禦能力。
- 基於上述的憂慮，美國認為僅僅提供歐洲經濟援助是不够的，美國必須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積極介入歐洲事務。透過美國與西歐盟邦的合作，使西歐不致落入蘇聯帝國手中⑧。

北約組織成立三十年來，美國與西歐盟邦的關係雖因東西方和解，以及西歐本身的政治經濟發展，而有起伏不定的改變。但至今可以確定的是：防衛西歐仍是美國國家戰略的主要部分；換句話說，維持及加強美國對西歐的影響力，仍是任何白宮決策者所欲追求的目標。而西歐在美國對外政策天平中所佔的份量，常常使其他地區的國家產生美國太過重視歐洲的感覺。對於這種感覺，當初身為北約主要設計者之一的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 (Dean G. Acheson)，曾小心地加以解釋。

艾奇遜將美國與西歐視為鐵幕外的兩大權力中心，讓美國與西歐合作，並非表示美國認定歐洲人較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人民優秀；而只是一個優先次序的問題：即一個其有效率的西歐北美組織，才可以提供新興國家所需的協助。西歐是美國提供自

⑥ 李其泰、國際政治，正中書局印行，民國五十七年十月，頁二六六—二六七。

⑦ 北約組織的創始會員國是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英國、荷蘭、冰島、義大利、盧森堡、挪威、葡萄牙及美國。隨後，希臘、土耳其及西德相繼獲准加入。

⑧ Alvin J. Cottrell, James E. Dougherty, *The Politics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4), pp. 14-16

由世界安全和機會不可或缺的夥伴。雙方在地理、歷史、人口、資源、技術等方面的結合，可以完成上述目標。西歐與北美的人口，加起來為蘇聯的兩倍；生產力為蘇聯的三倍。因此，西歐北美的結合，可以建立一個軍事防衛與經濟發展的廣大基地。只有西歐北美聯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才可以在安全及自由選擇其本身道路的環境中，求得發展。基此，無論是已開發或未開發國家，自由世界的希望乃繫於西歐北美的密切協調及經濟成長<sup>⑭</sup>。

艾奇遜以後的美國外交謀士，在強調西歐重要性的程度上雖有不同，但西歐一直被視為美國對抗蘇聯的一個重要夥伴。以下僅列舉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 與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觀點作為代表：

季辛吉在其「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書中指出：「如果歐亞 (Eurasia) 受到敵對的勢力或勢力集團所支配，則我們將遭到難以抵抗的威脅。歐亞的關鍵是西歐。因為西歐的淪陷將導致中東的淪陷及非洲的動亂。如果上述情況發生，則在一場全面戰爭中，蘇聯將獲取戰略利益。如果美國仍將自己侷限於『美洲堡壘』(Fortress America)，或蘇聯的擴張大到削弱我們盟友的對抗意志，則西半球將遭到大約人類四分之一人口及相當數目的資源的對抗，屆時，我們的繼續存在將受到違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最好也不過是訴諸於軍事努力，而此軍事努力是與目前我們所認定的美國生活方式相互矛盾的」<sup>⑮</sup>。

布里辛斯基強調：美國與西歐合作以使歐洲重新結合，以及使俄國人再度進入西方文明的過程，似乎是最持久及最有力的聯合。美國與西歐的此一聯合，同時符合美國及歐洲的長程利益<sup>⑯</sup>。

## 二、共同市場與西歐統一運動

馬歇爾計畫的實施，使歐洲國家迅速地自戰爭的廢墟中，建立起它們的家園。實際上「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來，歐洲自由國家的平均經濟成長，甚至超過美國。在戰後不到十年期間，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歐洲人即享有世界上增加最為快速的生活水準。」<sup>⑰</sup>

由為受到戰爭的洗劫，西歐國家已體認到團結合作的必要，即從經濟的合作，擴展到政治上的統一。對於西歐政治家而言，

<sup>⑭</sup> Ibid., pp. 17-18.

<sup>⑮</sup> Henry A.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7), pp. 269-270.

<sup>⑯</sup> Zbigniew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pp. 258-259.

<sup>⑰</sup> Cottrell and Dougherty, *op cit.*, p. 108.

一個「歐洲合衆國」的誕生，乃是他們企求最高的理想與最後鵠的。

歐洲目前達到成立「合衆國」的目標尚有一段距離，但西歐統一 (Unity)，已成爲戰後西歐政治舞臺上的一項重要發展。涉及西歐統一這個問題，我們首先應從政治整合與經濟整合這兩個概念出發，加以探討。

所謂政治整合，它指的是一種過程，其概念化的基礎是：參與此過程的角色 (actor) 對利益及價值的認知 (Perception) 。

當它們的認知滲入一特定的類型時，整合即告發生，否則，整合即歸於失敗<sup>①</sup>。有關經濟整合的定義，一般認爲這是「一羣國家之間重要經濟連繫 (links) 的存在。」此一定義在運作方面太過含混，故需加以拒斥。值得重視的是，這些連繫的發展可能來自某種組織，而這些組織並非代表政治羣體 (Community)，或是針對政治羣體而發。經濟整合如與羣體的演變有關，必須具備下列特點：

- (1) 協議逐漸並且完全消除成員國之間的關稅、配額以及貿易的相互控制；
- (2) 無論產生何種困難，在協議持續期間，必須放棄片面恢復貿易限制的權力；
- (3) 採取聯合行動，共同對付因掃除社會羣體中貿易障礙而產生的問題，並且共同促進區域內資源的有效運用；
- (4) 在影響物價結構及資源分配的各國政策間以及各國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之間，應達致某種程度的協調；
- (5) 在資本及勞工方面，採自由，或更爲自由的活動<sup>②</sup>。

如果經濟整合不是伴隨一個中心制度或中心政策的成長，則此經濟整合不是必然會導致一個政治羣體。因爲，缺乏一個中心制度或政策，則無法加諸壓力使各種期望有效實施。在這種情況下，自由貿易則不能說是相當於政治整合。單純的計算經濟成功的標準，諸如價值的成長、貿易額，以及工資標準等因素，並不能作爲政治成功的指標。因此，從經濟整合衍生而來的政治成就，乃是以受到經濟整合過程影響的政治角色的期望、需求與忠誠爲基礎，而不是以經濟成就的統計指數作爲基礎<sup>③</sup>。

基於上述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的定義，我們發現西歐戰後在經濟整合方面已有重大的成果。誠然，這些成果雖未必然地促成西歐的政治整合，但西歐國家希望透過經濟的合作，而加強彼此在政治方面的相互了解。

在討論西歐經濟整合與政治整合的關係時，我們先就西歐的經濟整合過程加以敘述。一九四八年四月，奧地利、比利時、丹麥、法國、西德、希臘、冰島、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瑞士、土耳其、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國及南斯拉

<sup>①</sup> 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1

<sup>②</sup> *Ibid.*, pp. 11-12

<sup>③</sup> *Ibid.*, pp. 12-13

夫等十九個歐洲國家，成立了一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共同協調馬歇爾計劃援助的使用。這個組織是由歐洲人針對他們本身的問題組成的。而真正提供歐洲經濟整合架構的則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成立的「歐洲協會」(The Council of Europe)。<sup>28</sup>

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法國外長舒曼(M. Robert Schuman)向「歐洲協會」的「諮商會議」(Consultative Assembly)提出了「歐洲煤鋼聯營」(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的計劃，此即一般所稱之「舒曼計畫」(Schuman Plan)。根據舒曼的計畫，法、德兩國的煤鋼所有生產，皆置於一個聯合的最高當局(High Authority)名下統一支配使用，其他歐洲國家亦可成爲此最高當局之一員。最高當局可以建立一個單獨的煤鋼市場，而不採取津貼、關稅及任何歧視或限制性的措施。當局的成員不必受到他們個別政府的指示，此最高當局並非像戰前的「卡泰爾」(Cartel)那樣僅爲一單純的工業組合，而是一個獨立的超國家機構。在此機構中，成員國應放棄其某種程度的主權。舒曼相信，西歐不需要建立一個官僚控制的經濟，即可達到增加生產、擴大貿易、減低價格及提高生活水準等一般性目標。舒曼並且強調，他的建議所包含的潛力，雖一時不能完全加以衡量，但却足以帶向一個歐洲經濟統一與政治統一的目標。<sup>29</sup>

根據舒曼的計畫，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一九五一年四月簽訂了巴黎條約，成立「歐洲煤鋼聯營組織」，將舒曼的理想付諸實施。

對於西歐的統一運動而言，歐洲煤鋼聯營的實施，提供了下列幾點有趣的教訓：

- (1) 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在趨向歐洲統一的演變中，經濟整合似較軍事整合或政治整合來得容易；
- (2) 如果能將個別國家政府的問題或政策列入考慮，則建立超國家機構的想法，似乎可行；
- (3) 完成某一經濟部分的整合，有助於建立擴大整合範圍的欲望。<sup>30</sup>

由於「歐洲煤鋼聯營」的成功，導致以後「歐洲原子能羣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ATOM)及「歐洲經濟羣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俗稱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等組織的出現。其中對西歐經濟整合的影響最大，及最具發展潛力的是「歐洲共同市場」組織。

「共同市場」是由「歐洲煤鋼聯營組織」的六個成員國，根據它們在一九五七年簽訂的「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而成立的一個組織。羅馬條約共有二百四十八項條款，加上其他附錄、議定書、慣例及聲明等文件。根據羅馬條約的規定，共

<sup>28</sup> Cottrell and Dougherty, *op. cit.*, p. 111, 114.

<sup>29</sup> *Ibid.*, p. 115.

<sup>30</sup> *Ibid.*, p. 127.



同市場之下設立了四個主要機構，以及針對特殊目的而成立的其他附屬機構<sup>23</sup>。

歐洲共同市場成立以後，成效著著，會員國由逐年減低銷售貨物的關稅，進而達到完全免付關稅，並放寬貿易額限制與擬定共同的農業政策。共市的成立，不僅為六個創始會員國的經濟帶來繁榮，並使六國聯合為一強大的經濟體系。

共同市場的運作，不僅促使西歐的經濟整合，並且為西歐的進一步政治團結，立下良好的基礎。共市在政治上的最大意義是成員國的擴充，特別是英國的加入，以及法國和西德經由共市組織的改善關係。

英國進入共市的主要障礙是來自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實際上，戴高樂對所謂的大西洋羣體 (Atlantic Community) 並不關心，他關注的是法國的利益，及使法國成爲一個世界強權。就戴高樂的觀點看，一個小規模的西歐國家集團，其行動一方面應介於美國與英國之間；另一方面應介於美國與蘇聯帝國之間。如就長程的觀點看，戴高樂主義者認爲一個較大的歐洲集團，應穿過東歐，直達俄國心臟地帶。如果共黨統治凋萎的話，大歐洲的計畫必有可能實現。無論是小歐洲或是大歐洲的藍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戴高樂及其追隨者並未將美國與英國包括在內<sup>24</sup>。

戴高樂下臺以後，龐畢度 (George Pompidou) 於一九六九年六月繼任爲法國總統。龐畢度鑒於他前任者的失策，有損於歐洲集體經濟之繁榮與政治之團結，在英國加入歐市這個問題上，採取彈性的立場。由於法國的妥協，英國於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爲歐市會員國，愛爾蘭與丹麥亦同時加入。會員國由原來六國擴大爲九國<sup>25</sup>。歐市成員的擴大，使若干歐市計畫者認爲，下一個合理行動將是進一步建立一個超國家歐洲權威的經濟與政治整合<sup>26</sup>。

對於歐洲的團結而言，法國與德國的和解，被認爲是戰後歐洲政治的一項重要發展。法德關係向極不睦，戴高樂與西德的修好政策，頗富戲劇性。戴高樂認爲，任何外來勢力控制下的西歐整合，最後都將成爲美蘇兩國其中之一的利用工具。戴高樂希望以法德合作，來代替美國領導下的所謂大西洋社羣。戴高樂心目中的法德聯合，基本上是從法國的利益出發的。因爲，戴高樂覺

<sup>23</sup> 四個主要機構的名稱及其職掌的事務分別爲：(1) 委員會 (Commission)：擬議共市政策及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機構；

(2) 部長會議 (Council of Ministers)：決定共市政策，是主要行政負責部門。

(3) 會議 (Assembly)：爲一有限的議會組織。

(4) 正義法庭 (Court of Justice)：判決因條約引起的法律問題。參見 Christian A. Herter, *Toward an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3) p. 19

<sup>24</sup> Elliot R. Goodman *The Fate of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5) pp. 52-53 戴高樂的觀點影響到法國對北約組織的態度。一九六四年法國宣布退出北約軍事體系。同年，一名北約高級官員表示，在北約計劃的二十七個未解決問題當中，有二十二個問題與戴高樂的不合作政策有直接關係。

<sup>25</sup> 挪威本來也獲准加入歐市，但挪威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廿六日舉行公民投票，否決加入歐市。挪威的農民漁民受到國家特別保護，他們恐怕加入後會失去若干特權。同時，挪威當時居多數黨地位的社會黨，鼓吹歐市是以保護工商界利益爲優先，對工人缺乏關切。挪威公民投票結果顯示，挪威公民不贊成政府加入歐市。

### 芬蘭化：蘇聯對西歐的戰略設計

得西德再武裝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法國終究會在政治，甚至軍事方面，扮演西歐地區的領導角色。

一九六三年一月，戴高樂與當時西德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簽訂了「法德友好條約」(Franco-German Friendship Treaty)。戴高樂強調這項條約，「可為往後提供一個範例及可被擴大的架構」；「為歐洲國家聯合執定歐洲人的政策的一個模式」。在戴高樂必目中。法德條約是組成「歐洲人的歐洲」的公開「楔子」(Wedge)。<sup>28</sup>

戴高樂以法德為中心的歐洲概念，令西德覺得尷尬。因為戴高樂之排斥美國，使西德擔心蘇聯的影響力會趁機介入。儘管如此，戴高樂與西德修好的政策，已成為法德以後政治領袖尋求的目標。在西德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與法國總統季斯卡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主政下，德法兩國已進一步地合作。而德法的合作，對於西歐的統一，是主要的推動因素。<sup>29</sup> 儘管戴高樂的獨斷行為，使西歐建立一個超國家機構的努力，受到相當程度的阻礙，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統一的西歐，乃是戰後歐洲的一個發展中的特色。<sup>30</sup> 因為，在完成西歐統一方面，雖有若干目標需要達成<sup>31</sup>，但對西歐國家而言，「統一」是它們在當前國際環境下的最佳「選擇」<sup>32</sup>。

<sup>28</sup> "Fresh Hope for a U. S. of Europe, Four More Nations Accepted into Common Market," *U. S. News & World Report*, Vol. LXXII NO. 5 January 31, 1972, P. 82

<sup>29</sup> Elliot R. Goodman, *op. cit.*, pp. 68-69

<sup>30</sup> Ronald Koven and Michael Getler, "Giscard Plus Schmidt Make Power Bloc, Pair's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Means Leadership for Rest of Europe", *Washington Post*, quoted in *The Japan Times*, October 4, 1978

<sup>31</sup> 對於西歐的統一運動，以杜意志 (Karl Deusch) 為首的一組研究團體發現：「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來，歐洲整合已趨緩和，而自一九五七至五八年以來，歐洲整合完全停止或達停頓狀態。」而當初期望建立統一歐洲的史派克 (Paul Henri Spack)，到一九六七年時公開表示失望，承認他過去的想法，乃純屬幻覺。另一方面，林柏 (Leon Lindberg) 與海那士 (Haas) 却認為歐洲整合自一九五七年後，大大向前邁進。林柏認為杜意志的國際整合觀念，較屬社會或道德社羣理論，而忽視其政治相關意義。股列列哈特 (Ronald Inglehart) 在研究西歐政治社會化時，其獲致的結論亦與杜意志不同，他認為歐洲整合自一九五八年以後，有快速地發展；富萊德瑞 (Carl Friedrich) 對杜意志的研究方法也展開攻擊，認為他的研究對歐洲的演變，導致錯誤的結論。富萊德瑞發現，歐洲共同市場內的各國人民，已逐漸塑造一種新想法，認為歐市應為一具有統治與防衛合法權威的社羣，勒那 (Daniel Lerner) 與葛登 (Morrison Gordon) 所領導的一羣研究團體，對杜意志的研究亦展開挑戰，認為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力量正逐漸消失，歐洲可能成爲一個超國家的統一體。參考 Elliot R. Goodman, *op. cit.*, pp. 224-226.

<sup>32</sup> 在法德領導下，歐洲在政治與經濟的進一步整合，至少需在下列三方面努力：(1) 統一的貨幣制度；(2) 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3) 歐市成員的擴大，包括希臘、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內。參考 Elizabeth Pond, "Bann and Paris Pulling together for Europ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16, 1978.

<sup>33</sup> 在美蘇兩個超級強權之間，西歐可以在下列三種或四種道路中選擇：(1) 西歐維持分裂，及追隨美國，但追隨美國必須依靠美國的軍事及政治承諾，而在美國國內，對西歐提供軍事或政治承諾的想法已漸不受歡迎；(2) 西歐可以維持分裂或衰弱，而直接置於蘇聯或美國的影響之下；(3) 西歐可以保持分裂，並在一些藉口或權宜下，投入蘇聯的懷抱；(4) 西歐可以團結來起，在某些方面，於美蘇間建立一個平衡的實體，可能的話，與美蘇同時保持密切的聯繫。前面三種選擇，雖然可以立刻完成，但對美國與西歐雙方却是大的變動。第四種選擇是西歐所期望的，但其前提是必須獲得美國的協助與蘇聯的接受。Richard B. Foster, Andre Beaufre, Wynfred Joshua ed., *Strategy for the West, American-Allied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1974), pp. 227-228

### 三、歐共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在過去二十年，歐洲共產主義曾發生很大的變動。針對當地的政治與社會環境，若干西歐共黨試圖調整它們的政策，因此在整個歐洲舞臺上，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何謂歐共主義？一般而言可分為下列三種不同的看法：(1)認其為一新生事物，與蘇共、中共、狄托主義在理論、政策各方面皆差別很大。此前西德前總理布朗德與荷蘭、比利時社會民主黨之看法；(2)認其為國際共黨之新陰謀，是為欺騙自由世界而發明的二十世紀下半葉共產主義統戰策略之新面貌，此派代表人物為歐洲保守黨派，以及社會民主黨之右翼；(3)認其與全世界之共產理論基礎，及其長期目標是相同的，只是策略與方針不同而已，此派學者與專家建議：我們要分別就西歐每一個共黨，作個案研究，以決定歐共主義是國際共黨之一種新趨向，還是一種陰謀<sup>②</sup>。

基於西歐各國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我們認為採個案研究的方法，來探討歐共主義的意含，是比較適當的。例如，義共與法共雖同屬西歐共黨，但義共多年來即承認與天主教接觸的必要性，因為義大利人多數信奉天主教；法共則不願與天主教對話，害怕會妨礙法共與其他左派團體的共同行動。此外，法共對義共的野心也表示懷疑<sup>③</sup>。

儘管西歐共黨有其各別的發展方向，但義共、法共、西共等主要共黨之間，仍有若干共同的根基 (root)，並因此產生若干特徵。

西歐共黨具有的共同根基可歸納下列三點：(1)這些共黨長久以來即存在於一個「非革命」(nonrevolutionary)的環境中，這個環境已逐漸將一羣工人階級，整合進入他們的先進社會裏。同時，在一個處於相當孤立及對現行決策缺乏影響力的境況下，西歐共黨要維持其羣眾吸引力，也非常困難。(2)由於反對史達林運動造成的危機、中蘇共的分裂，以及蘇聯集團以外共黨決策自主範圍的增大等因素，導致蘇聯共黨國際權威地位的下降。(3)在東西方和解的環境下，加上衰退及通貨膨脹等經濟難題，使西方共黨能調整其思想及戰略，因而使西歐共黨獲得克服它們孤立的新機會。上述這些共同根基，使西歐共黨產生下列特徵：(1)拒絕以俄國十月革命，或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作為擁有民主傳統的先進國家所適用的模式。(2)拒絕作為共黨國際中心的戰略附屬物。(3)拒絕列寧主義所說：必須粉碎民主國家並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那樣的教條。反之，西歐共黨贊同多元民主的承諾<sup>④</sup>。

歐共主義一詞的出現，是從一九七五年七月義共與西共、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中旬義共與法共以及十一月底法共與西共分別舉

<sup>②</sup> 杜勉，「『歐共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與研究，第十七卷，第一期，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六十六年十月十日，頁一。

<sup>③</sup> David T. Cattell, "The U. S. S. R. and the West", *Current History*, Vol. 51, No. 302, October, 1966, pp. 198-199.

<sup>④</sup> Richard Lowenthal, "Moscow and the Eurocommunists,"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78, p. 38.

行會談後開始。法共向以親蘇著名，且有「莫斯科的侍婢」之稱。但當法共籌備第二十二屆大會，並與義共、西共之間結成戰略同盟時，法共的立場有了改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義共總書記柏林格（Enrico Berlinguer）與法共總書記馬塞斯（Georges Marchais）在羅馬會談後，發表一篇可以稱之為「歐共宣言」的聲明，雙方承諾支持「政黨的多元化、支持反對黨存在與行動的權利，以及支持多數與少數之間的民主選擇。」柏林格與馬塞斯並且強調：在義大利與法國建立的社會主義秩序，必須具有經濟、社會與政治生活方面持續民主化的特點。同時，現存的資產階級自由，亦應受到保障及發展。聲明中表示：這是爲了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爲了國內外人士自由流通，以及爲了私人生活免受侵犯與宗教的自由。聲明保證所有現行哲學、文化、藝術等意見的表達自由。另外，從區域性的角度出發，法共與義共領袖誓言促進西歐共黨、社會主義政黨及所有民主與進步勢力，採取共同行動<sup>55</sup>。

柏林格與馬塞斯的聯合聲明，很快地在西歐許多少小的共黨組織中引起「共鳴」，甚至影響到亞洲的日本共黨。無論法共與義共對自由與民主的承諾具有多大的誠意，聲明本身已對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形成挑戰，並直接影響到西歐國家的政治現狀。

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東柏林舉行的歐洲共黨會議中，西歐共黨領袖通過了一項最後文件，明白表示所有共黨的獨立與平等，並以自願的國際團結，代替蘇聯共黨強調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方式<sup>56</sup>。

自從歐共主義這個名詞出現後，大西洋兩岸的人民，已不僅是從理論上探討其意義，並且逐漸關切法共、義共等西歐共黨，是否會在他們國內聯合政府中，居有一席之地。

在義大利，義共是僅次於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Party）的第二大黨，基民黨之執政，必須依賴義共在國會的支持。但在一九七六年義大利國會（Parliament）選舉中，義共增加了百分之七的選票，共獲得百分之三十四點四的選票，基民黨僅以百分之三十八點七的選票，些微領先。

在法國國會（National Assembly）一九七八年三月的大選中，法共較一九七三年的選舉中，多贏得十四個席次。

在西班牙，共黨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國會（Cortes）選舉中，雖僅得到百分之九的選票，但西共領袖卡瑞洛（Santiago Carrillo）爲吸引民衆支持，繼續對蘇聯展開攻擊，並以馬克思主義者形容西共，而移去列寧主義者的字眼。

義共與法共以議會鬭爭方式奪取政權的企圖，自一九七八年夏天以後，即遭到挫敗。雖然如此，西方觀察家覺得，如果西歐國家未能提出有效辦法解決失業及通貨膨脹等問題，義共、法共等西歐共黨，仍有能力在西歐製造麻煩<sup>57</sup>。

<sup>55</sup> Kevin Devlin, "The Challenge of Eurocommun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uary-February, 1977, pp. 9-10

<sup>56</sup> Richard Lowenthal, *op. cit.*, p. 41 會議最後文件由區谷德考 Pravda, July 1, 1976.

<sup>57</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28, 1978, p. 14

## 叁、蘇聯與芬蘭的關係

### 一、地理因素與歷史背景

研究蘇聯對外政策的學者，常常從地緣政治的觀點，視安全的需求，為蘇聯對外決策的主要因素。蘇聯的邊界自芬蘭已至韓國，大都是為一羣所謂緩衝國所隔離。根據蘇聯的歷史經驗，如果將戰爭遠離蘇聯本土，則克里姆林宮必須將這些緩衝國關進鐵幕，或是成為蘇聯的「附庸」。從另一個角度看，積極的安全需求，往往演變為擴張主義的傾向。蘇聯戰後的擴張政策，其首要目標大都為其鄰近的國家。無論基於何種考慮，芬蘭皆面臨蘇聯的侵略威脅<sup>⑤</sup>。

在帝俄時代，芬蘭為瑞典一省達七百年之久。但在二〇〇九年，芬蘭終為帝俄強佔，並且變成沙皇政權下的一個「大公國」(Grand Duchy)，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芬蘭宣布獨立。列寧表面上支持芬蘭的獨立，但實際上，並不願意放棄沙皇時代對芬蘭的佔領。因此，芬蘭獨立後，必須與蘇聯共黨，以及蘇共支持的芬蘭共黨，從事獨立戰爭<sup>⑥</sup>。

一九三二年，芬蘭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芬蘭在外交上採中立政策，但却一直受到蘇聯軍事與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蘇簽互不侵犯協定，其中的秘密附加議定書第一條規定：「如果屬於波羅的海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地維亞、立陶宛）的地區，作領土的政治的調整時，德蘇的勢力範圍，應當以立陶宛的北境為界」<sup>⑦</sup>。從此芬蘭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

一九三九年十月，蘇聯佔領波羅的海三小國後，向芬蘭提出下列的領土要求。

- ① 蘇聯取得芬蘭在加勒里士腰 (Karelian Isthmus) 上，面對蘇聯列寧格勒的一部分領土，約二千平方公里。
- ② 蘇聯取得芬蘭在芬蘭灣的五個小島。
- ③ 蘇聯取得芬蘭拉巴吉 (Rabathy) 半島的西部，包括柏查漢 (Petsamo) 港在內。
- ④ 蘇聯租借芬蘭的漢格 (Hangoe) 軍港三十年。

<sup>⑤</sup> 從地理因素來探討蘇聯對外政策。參見 George B. Cressey, *Soviet Potentials, A Geographic Appraisal* (U. S. 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86-192。

<sup>⑥</sup> V. I. Punasalo, "The Reality of Finlandisation, Livi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 *Conflict Studies*, No. 93, March 1978, p. 1

<sup>⑦</sup> 雷滋生，「國際關係」，前引書，頁四五一—四六。

蘇聯願意介乎拉多加湖 (Lake Ladoga) 與北冰洋之間的加勒里亞 (Karelia) 中部，來換取上述芬蘭領土，但遭芬蘭拒絕。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宣布廢止蘇芬互不侵犯協定，三十日，蘇聯以陸空兩路對芬蘭展開攻擊。一九四〇年二月，芬蘭政府無力對蘇作戰請求媾和，三月十二日，雙方在莫斯科簽訂和約，其中規定除了柏查漠仍由芬蘭保有外，蘇聯獲得一九三九年十月提出的所有要求，芬蘭把拉多加湖的北岸與西岸，都割讓與蘇聯，以致整個拉多加湖與維波爾 (Vyborg) 都為蘇聯所有<sup>④</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芬蘭雖為英國以外，唯一免受敵軍佔領的歐洲交戰國家，但蘇聯支持的芬共却是芬蘭內部動亂的主要來源。戰後，芬蘭與蘇聯的關係，成為芬蘭政府面臨的嚴重問題。

## 二、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在戰後芬蘭與蘇聯的關係方面，有兩項條約使蘇聯獲取重大利益，並直接影響到芬蘭的內政與外交。

第一項條約是一九四七年的巴黎和約 (Paris Peace Treaty)，此約確定芬蘭割讓蘇聯大片土地，並予蘇聯在芬蘭赫爾辛基西面——波卡拉 (Porokkala) 軍事基地的權利。此外，巴黎和約並規定芬蘭軍備的限額，使芬蘭在軍事動員方面遭到阻礙<sup>⑤</sup>。另一項對芬蘭影響重大的條約是蘇芬雙方在一九四八年簽訂的「友好、合作及互助條約」(The 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這項條約賦予芬蘭對抗德國或其盟友，對芬蘭領土實施攻擊，或是假道芬蘭攻擊蘇聯時的義務。同時，根據條約的規定：當面對武力攻擊威脅時，蘇聯有權要求芬蘭進行軍事「磋商」；芬蘭不得組成或參加任何針對蘇聯軍事同盟，芬蘭的行動必須以發展蘇芬經濟與文化安排的合作友好精神作為依據。蘇芬條約顯示，芬蘭的對外政策已不再具有傳統的中立色彩<sup>⑥</sup>。

在締結這項條約時，當時的芬蘭總統帕西基維 (J. K. Paasikivi) 了解蘇聯可能會藉此條約控制芬蘭，但是，帕西基維認為締約之舉，值得一試<sup>⑦</sup>。

蘇芬「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一九五〇年代時曾予延續，並在一九七〇年時再度延續二十年。對蘇聯而言，這項條約被視為芬蘭關係的「轉捩點」，「為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存，建立一個良好的範例。」以後事實證明，芬蘭的政策已

<sup>④</sup> 同上，頁五〇—五十一。

<sup>⑤</sup> Punasalo, op. cit., P. 2. 蘇聯在一九五六年將波卡拉基地交還芬蘭，因為此一基地戰略價值降低，同時蘇聯欲藉此表示它在國外無軍事基地。

<sup>⑥</sup> Ibid.

因蘇芬條約而受到蘇聯控制。繼帕西基維之後在一九五六年當選芬蘭總統的凱柯楠 (U. K. Kekkonen) 即曾在一項電視訪問中承認：「芬蘭的外交及貿易政策，乃是受到蘇芬條約的指導。」<sup>④</sup>

### 三、蘇聯在芬蘭的利益

蘇聯在芬蘭的利益可以從政治、意識形態、軍事與經濟四個層面來探討。

(1) 政治的利益。蘇聯一方面以干預芬蘭內政，另一方面利用芬蘭政客，表現及強化其對芬蘭的政治影響力。一九五八年，芬蘭成立聯合政府，共黨及其盟友處於反對黨地位。共黨之被排斥於內閣門外，令蘇聯感到不悅。當時蘇聯駐芬蘭大使利比迪夫 (V. Z. Lebedev) 公開表示其政府對芬蘭政治現狀的「遺憾」。當芬蘭內閣成立兩周後，利比迪夫「莫名其妙」地離開芬蘭，蘇聯並凍結與芬蘭的貿易談判。蘇聯的壓力得到反應，若干芬蘭政客改變了他們原先的立場，一些「中立」的部長宣佈自內閣辭職，成立不到四個月的芬蘭內閣實際上已趨於瓦解。一九五九年一月，凱柯楠訪蘇，要求赫魯曉夫提供「建議」，使芬蘭的政策能符合克里姆林宮的願望。凱柯楠回到芬蘭後，強調芬蘭必須放棄境內任何反蘇的作品；莫斯科立刻恢復與芬蘭的貿易關係，並任命新的駐芬大使<sup>⑤</sup>。

對於蘇聯而言，凱柯楠是一個值得利用的芬蘭政客，被認為是一個「可信賴的」(safe) 領袖。為了確保凱柯楠的總統寶座，蘇聯不惜採軍事威脅及收買芬蘭政客的手段。因此，自一九五八年後，除非受到蘇聯「護航」，沒有人能夠取得芬蘭內閣席位。一九七三年，芬蘭通過緊急法案，延長凱柯楠第三屆六年總統任期至一九七八年為止。凱柯楠左右的支持者總是強調，只有凱柯楠出任總統一職，才可確保芬蘭邊界的安全，免於受到蘇聯的干預。因為，凱柯的是蘇聯「喜愛」的人物<sup>⑥</sup>。

(2) 意識形態的利益。蘇聯駐芬蘭大使巴加柯夫 (A. Baljakov) 在一九七〇年曾告訴芬蘭共黨，為了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發展一套新的模式是相當重要的。對於那些擁有相當高度經濟福利的工人羣衆，以及因為工人羣衆的政治冷漠產生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已開發國家而言，蘇聯對芬蘭的政策提供了一套適應環境的模式。蘇聯一方面扶植芬蘭共黨，使芬共獲得參政的機會；另一方面在芬蘭傳布共產主義，以蘇芬間的「和平共存」，作為蘇聯對西方式社會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模式<sup>⑦</sup>。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June 6, 1972, p. 87 &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October 10, 1972, p. 96

<sup>⑥</sup> Punasalo, op. cit., p. 3

<sup>⑦</sup> Ibid., pp. 3-4

<sup>⑧</sup> Ibid., p. 4

(3) 經濟的利益。長久以來，芬蘭即是蘇聯在共黨集團以外的最主要貿易夥伴。就以一九七八年為例，雙方的貿易額即達三十億美元。蘇聯與芬蘭的經濟聯繫，對蘇聯有利，而芬蘭却遭到損失與許多限制。

芬蘭是蘇聯通向西方市場的重要出口，經由芬蘭，蘇聯獲得西方的科技。蘇聯與芬蘭的長期貿易關係，使蘇聯利用在芬蘭的工業間諜，竊取西方的科技情報。例如，西方曾售與芬蘭若干電子知識，條件是芬蘭不得將之轉手予蘇聯。但莫斯科仍舊能透過一些芬蘭人，成功地獲取這些知識。

對芬蘭而言，與蘇聯貿易結果是得不償失。芬蘭自蘇聯進口的大部是原油、礦產、木材等原料，這些原料的價格超過世界市場的定價。就以原油為例，芬蘭主要依賴蘇聯供應，這些原油的價格往往比世界市場高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此外，芬蘭必須被迫作為蘇聯工業產品的市場，蘇聯的產品常常不合西方的品質要求。「真理報」有一次曾警告說，如果芬蘭不向蘇聯訂購火車引擎，則表示芬蘭破壞雙方的友好條約。

蘇聯除了以經濟的聯繫作為施展政治壓力的工具外，莫斯科並且限制芬蘭與西方的經濟合作，蘇聯害怕如此會增加芬蘭對西方的政治依賴<sup>④</sup>。

(4) 軍事的利益。蘇聯與芬蘭邊境長達一千二百六十九公里，蘇聯傳統上即視芬蘭為蘇聯面對西方的西北緩衝區。整個芬蘭北部都是一重要戰略地帶，由於挪威與丹麥屬北約成員，瑞典是中立國家，芬蘭在維持現狀方面可以提供若干保障。因此，當挪威進行與西德軍事合作，北海油田的重要性日增，以及白令海的爭執等問題出現後，蘇聯認為將芬蘭置於控制下是刻不容緩的<sup>⑤</sup>。

芬蘭對蘇聯的軍事重要性是：北約與華約的利益在芬蘭北部呈對峙之局。除了芬蘭北部外，西南部羣島地位也很重要，這些羣島是控制波羅的海的關鍵所在。

受到巴黎和約的限制芬蘭在軍事上是屬於「真空」狀態的，只要蘇聯願意，莫斯科隨時可藉「蘇芬條約」之名，侵佔芬蘭。但對蘇聯而言，讓芬蘭保持軍事虛弱，較公然入侵，合乎蘇聯現階段的利益。根據瑞典國防人士的報告，經由芬蘭與蘇聯之間的鐵路與公路網，蘇聯可以同時運送十二師的部隊到芬蘭領土；另外，透過芬蘭的戰略地理位置，蘇聯海軍必要時可以控制美國與歐洲的聯繫。因此，讓芬蘭處於衰弱狀態，不僅使蘇聯易於控制芬蘭，並且是蘇聯對西方進行閃電攻擊的捷徑。西德的一篇研究報告亦指出，當東西方衝突爆發時，芬蘭將成爲一個主要的戰略通道，蘇聯地面部隊可經由芬蘭到達挪威，其海軍可以使用芬蘭灣及波羅的海，直驅西方。此外，蘇聯駐在芬蘭的「外交」與「領事」人員，也可從事間諜工作，透過芬蘭與西方的接觸，間接獲取西方的軍事情報<sup>⑥</sup>。

<sup>④</sup> Ibid., pp. 4-6.

<sup>⑤</sup> Ibid., p. 7.

<sup>⑥</sup> Ibid., pp. 7-11.



#### 四、芬蘭化的意義

「芬蘭化」這個字眼是德國教授魯汶索爾 (Richard Löwenthal) 在一九六六年首先使用的，不久，便成爲西方世界中廣泛使用的一個政治字彙。德國人使用芬蘭化一詞時，將它視爲一種環境 (Situation)，在這個環境中，某些國家因位居一個具有不同社會秩序及使用變橫的政治手段的強權之鄰，而在對外方面實施中立化政策。因此，芬蘭化代表一個國家對內雖具有完全權威，但對外決策的權力却相當有限<sup>⑤</sup>。

實際上，一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是密不可分的，特別就共黨強調的觀點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乃是其內部政治制度的延續。何況，從上述蘇聯在芬蘭的利益面分析，芬蘭不可能在對外決策有限的權力下，能在對內方面具有完全的權威。因此，德國學者對芬蘭化一詞所作的解釋，並不能正確地指出芬蘭化在實際運作中包含的意義。

針對蘇聯與芬蘭的關係，我們認爲「芬蘭化」在蘇聯心目中，是蘇聯與某一國家的關係模式，其包含的意義有下列幾點：

- (1) 蘇聯藉與一個國家政治領袖 (選擇性的) 的合作，影響這個國家的政策目標。
- (2) 蘇聯藉與一個國家的條約關係，對這個國家的決策權力產生束縛的作用。
- (3) 在內政方面，這個國家須予共黨特殊地位，其大眾傳播工具須採親蘇立場。
- (4) 在經濟方面，蘇聯儘量使這個國家對蘇聯產生依賴，必要時，蘇聯可透過經濟聯繫而製造政治壓力。
- (5) 在軍事上，蘇聯使這個國家永遠保持衰弱，便於蘇聯的軍事干預。
- (6) 在意識形態方面，蘇聯在這個國家散布共產主義，腐蝕其國民的愛國心，及減低國民對其國家的認同感。
- (7) 在外交方面，蘇聯可以容許這個國家的「中立願望」，但必須以不違背蘇聯的世界觀爲原則，必要時，必須充當蘇聯對外政策的「喉舌」。

總之，芬蘭化在本文中代表的一個持續的過程，是一種沒有阻礙物的共黨革命形式；同時，芬蘭化代表爲了蘇聯的目標，而對經濟上工業上已開發國家的利用。這樣的國家與鐵幕內的蘇聯衛星國不同，因芬蘭化國家與自由世界存有某些經濟與人際間的自由關係。因此，芬蘭化是「從西方式民主到共黨制度的一種過渡階段。」<sup>⑥</sup>

<sup>⑤</sup> Ibid., p. 1

<sup>⑥</sup> Ibid., p. 13

## 肆、蘇聯在西歐實施芬蘭化的過程

## 一、削弱美對西歐影響力

由於美國戰後對西歐採取積極介入的政策，美國在西歐的影響力，形成蘇聯在西歐實施芬蘭化過程的首要障礙。因此，蘇聯除了設法減低西歐對美國的依賴外，並且努力製造西歐與美國之間的矛盾。

蘇聯對美國實施宣傳攻擊的第一項藉口是北約組織，並對美國擬議的「大西洋主義」，展開理論上的抨擊。莫斯科出版的「國際事務」月刊中表示：「大西洋主義，因為侵略性的北約軍事集團的成立，而表現出來。大西洋主義使緊張情勢進一步加深，並在歐洲心臟建立一個戰爭威脅的溫床。西歐國家採行大西洋政策，乃是符合美國的利益，有害於傳統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美國已發現，大西洋主義是加強其資本主義國家領導地位的有力工具，同時，是使西歐成爲美國對社會主義採攻擊行動的軍事戰略基地。所謂大西洋主義與大西洋團結，乃是美國對其夥伴加諸壓力，使他們的國家政策配合美國全球野心的工具。」<sup>⑤</sup>

蘇聯對於美軍在西歐的駐紮，不斷提出指責，而戴高樂之排斥美國於歐洲社會之外，以及法國退出北約軍事體系的做法，遂成爲克里姆林宮利用的對象。蘇聯認爲，戴高樂的政策不僅可以削弱西方聯盟，並且對美國在西歐的影響構成妨害。因此，蘇聯一再強調「希望法國在國際事務方面扮演更大及更獨立（反美）的角色。」<sup>⑥</sup>「真理報」故意提出蘇聯在戰時對戴高樂領導「民族解放委員會」（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支持，美國則否；赫魯曉夫在巴黎訪問時，強調了其對戴高樂及蘇法友好關係的尊重。這些跡象均表示，蘇聯希望看到法國力量的成長，而能導致美國在歐洲力量的下降<sup>⑦</sup>。

針對西歐國家戰後經濟整合的願望，蘇聯將歐洲共同市場視爲北約對抗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是美國穩固其支配西歐經濟與政治的工具<sup>⑧</sup>。莫斯科並且指控「華盛頓企圖阻止日本與西歐，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關係的正常化。」<sup>⑨</sup>雖然戴高樂統治下的法國，是蘇聯用來分化美國與西歐聯繫的工具，但是戴高樂以法德合作代替美國在西歐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却令克里姆林宮感到不安。因爲，就政治的觀點看，以大陸歐洲爲基礎的法德聯盟，對蘇聯西歐政策的挑戰，可能較美國發

<sup>⑤</sup> Y. Nalin, "Anti-Communism, Atlantic Varia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7 July, 1970, P. 49

<sup>⑥</sup>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op. cit., pp. 254-255

<sup>⑦</sup> A. Barinov, "EEC: Balance Sheet of the Transition Perio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7 July, 1970, P. 55

<sup>⑧</sup> B. Pichugin "East-west Economic Rel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11, November, 1970, P. 46

起的大西洋羣體更具威脅。「蘇聯考慮到美國的政治情況，了解蘇聯並沒有面對來自美國的威脅。如果美國對蘇聯有任何侵略性意圖，則美國在一九四〇年代或五〇年代美國獨佔核武器時，即可採取行動。因此，美國在西歐的駐軍並沒有對蘇聯形成攻擊性威脅，如果蘇聯能有效控制西歐，則美軍最終將會離去。美軍的防衛性質不會嚴重地阻止蘇聯的行動自由。蘇聯較擔心的是美國軍隊撤出後，可能出現的一個德——法——英軍事聯盟。」<sup>⑤</sup>

無論蘇聯的評估是否正確，我們發現，從一九六〇年開始，蘇聯過去讚美法國角色的立論，立刻為譴責的言詞所取代，蘇聯強調法國不僅尋求支配西歐，並且促成核武器的擴散。到了一九六二年，法國常被蘇聯指為國際緊張消除的主要障礙，至一九六三年時，蘇聯對法國的攻擊，因為法國之拒簽核子禁試條約，而達到最高潮<sup>⑥</sup>。

蘇聯對法國態度之改變，顯示以德法為主的歐洲團結運動，已對莫斯科的長程政治利益，形成嚴重挑戰。

## 二、分化西歐團結

「納粹主義的復活」，以及對西德「復仇主義」的憂慮，是蘇聯戰後初期對外宣傳文件中常見的字句。蘇聯希望德國保持永久分裂，却擔心西德在美國支持下，在政治與經濟各方面的長足發展。強調納粹主義復活，或是西德復仇主義的宣傳，對甫經戰火摧殘後的西歐，在心理上是有效用的。因為，蘇聯已利用了西歐對波昂實力日增的恐懼，以及西歐害怕西德會在「小歐洲」(Little Europe)扮演支配角色的心理。但在另一方面，蘇聯似乎注意到對西德的長久敵視會促使美國與西德的進一步聯繫。因此，蘇聯並不排除與西德接觸的可能。布里茲涅夫在捷克共黨十三屆大會中宣稱：「當我們努力阻止復仇主義的危險政策時，我們亦贊成西德加入歐洲各方的和平合作，如此將有助於歐洲安全的強化。」<sup>⑦</sup>

蘇聯對法德合作的憂慮，使克里姆林宮處心積慮地要分化法國與西德的關係。蘇聯認為「當小歐洲形成後，作為反動及軍國主義溫床的西德，即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國際主義的面具下，與美國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繫的西德重工業及財政巨子，在小歐洲中作領導者，因此，西德在小歐洲的經濟支配地位是很明顯的。西德希望以法國利益為犧牲，以及因承認英國入會而有利於大西洋聯盟及美國的利益，來增加西德在共同市場的重要地位。」<sup>⑧</sup>

時至今日，蘇聯仍極力避免西德與法國的進一步聯繫，並且利用各種場合，破壞法德間的友好關係。一名法國高級官員抱怨

<sup>⑤</sup> Richard Pipes, ed., *Soviet Strategy in Europe* (New York: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1976), p. 23.

<sup>⑥</sup> Brzezinski, op. cit., pp. 255-256.

<sup>⑦</sup> Cattell, op. cit., pp. 195-196.

<sup>⑧</sup> Georges Cogniot, "Lein Esm and the Destiny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5 May, 1970 p. 32.

說：「俄國人一直試圖在德法間插上一手，蘇聯告訴我們，我們正建立一個受到德國支配的歐洲；蘇聯又告訴德國，蘇聯在歐洲及東西方和解的對話中，可以代替法國作為西德的特殊夥伴。」<sup>⑤</sup>

對於法國在「歐洲整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蘇聯亦提出指責，蘇聯認為「那些反動勢力堅持法國可以不顧與蘇聯的傳統關係，經由對抗蘇聯、社會主義勢力，以及對抗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歐洲整合，來加強法國的國際角色及確保法國和平。但歷史經驗顯示：這種觀念不符合歐洲人民的真正利益，特別是不符合法國人民的利益。」<sup>⑥</sup>

透過西歐團結，以建立一個「歐洲合眾國」，乃是戰後西歐民主國家的共同理想。但蘇聯理論家却引用列寧在一九一五年的談話加以抨擊。列寧當時表示：「從帝國主義的經濟觀點看，在資本主義之下的一個歐洲合眾國是不可能，並且是反動的。」列寧的話顯示，這樣的聯盟是用來對工人羣衆的更大剝削，同時設計用來聯合各種力量進行對抗社會主義的鬭爭<sup>⑦</sup>。

歐洲統一對於蘇聯而言，是一項極為不利的發展，因為，蘇聯不僅將失去干預歐洲事務的機會，同時對蘇聯在東歐的獨霸地位，也產生腐蝕的作用，蘇聯在東歐的控制，將因此出現「合法」與「認同」的兩大危機。

因此，基於蘇聯本身的利益，莫斯科認為：「要完成歐洲的統一，應包括所有歐洲地區國家，而不論其社會經濟的不同制度，此即在所有國家間發展經濟、科技及文化合作，而不採歧視政策，是在和平共存及尊重各國主權的情況下合作……如果共同市場一方面促成其會員國的整合；則另一方面共市亦為加速歐洲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進步必須以全歐為範圍，而不是以部分歐洲為範圍。」<sup>⑧</sup>

基於上述看法，蘇聯自一九五四年開始，即擬議召開一項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經過將近二十一年的努力，這一會議終於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西方分析家認為，蘇聯因為歐安會的召開，至少獲得下列三項重大利益：(1) 使蘇聯帝國趨於穩定化；(2) 歐洲維持安定後，蘇聯可以避免兩面作戰疲於奔命，而專心在東面對抗中共；(3) 蘇聯對西方產生新的影響力。蘇聯利用和解削減西歐防衛努力，以及削弱美國與其北約盟友的聯繫<sup>⑨</sup>。

對於西歐統一而言，歐安會的完成，承認了歐洲現狀的維持，即使歐洲的分裂獲得東西雙方的「認可」，這是蘇聯歐洲政策的主要目標，也是蘇聯破壞歐洲統一的具體成果。

<sup>⑤</sup> *The Japan Times*, October 4, 1978

<sup>⑥</sup> Y. Rakhmaninov, "Soviet-French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11 November, 1970, P. 33

<sup>⑦</sup>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1, P. 340, quoted in Cogniot, op. cit., P. 31

<sup>⑧</sup> *Ibid.*, P. 32

<sup>⑨</sup>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8, 1975, P. 17

### 三、「和解」的策略運用

對於蘇聯而言，和解乃是和平共存的衍生物，西方學者在討論東西方的「和解」時，常常以一九七二年的美蘇莫斯科會議作為濫觴。實際上，自列寧開始，和平共存即是蘇聯處理對外事務的一個策略運用，此一策略，因為蘇聯領導階層的更迭，而強調的程度有所不同<sup>②</sup>。

在歐洲政治舞臺上，和解並未改變蘇聯使西歐芬蘭化的基本目標。蘇聯了解和解的空氣較冷戰的環境，更有助於蘇聯野心的實施。因此，蘇聯不可能採侵略性的舉動，而冒使西歐成爲一個相互協調的防衛組織的危險<sup>③</sup>。一個具有軍事凝聚力的西歐，不符合蘇聯的利益。

其次，從政治的觀點看，和解提供蘇聯干預西歐內政的機會。舉例而言，爲了與西歐國家執政黨派進行「和解」，蘇聯駐西德大使即爲西德「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大會，貿易聯盟大會，以及工業聯盟會議的「常客」。由於西德缺乏一個强有力的共黨從中搭橋，蘇聯即採與社會黨派直接聯繫的作法。蘇聯干預西德內政的最具體實例是：蘇聯對那些反對布蘭德(Brandt)「東進政策」(Ostpolitik)的人士，展開大規模的宣傳攻擊，特別是攻擊「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及「基督教社會聯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它們的領袖被蘇聯形容爲「復仇主義及修正主義」的典型與工具<sup>④</sup>。

在法國，勢力龐大的法共雖使蘇聯外交決策者在處理與法國政府關係時，常常面臨進退維谷之局，但從戴高樂以後蘇聯與法國執政黨派的關係看，蘇聯顯然採取現實主義的立場，蘇聯認爲除非採完全的革命，法國的經濟現狀不利於社會主義試驗，及不利由共黨擔負重任，因此，蘇聯情願法國維持政治現狀。<sup>⑤</sup>

蘇聯與法、德執政黨派的合作，說明蘇聯企圖獲取這些執政黨派對蘇聯政策的支持。如果這些西歐執政黨派採親蘇政策，則蘇聯的芬蘭化西歐戰略設計，即可達成成果。

此外，蘇聯認爲和解有利於西歐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七四年六月，「真理報」在一篇社論中，對於和解時代的革命前景

<sup>②</sup> 有關蘇聯領導階層對和平共存的策略運用，參看 Paul Marantz "Peaceful Coexistence: From Heresy to Orthodoxy", in Poul cookes, Robert V. Daniels, Nancy Whittier Heer, ed.,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93-308

<sup>③</sup> Richard B. Fester, ed., op. cit., pp. 2-3

<sup>④</sup> Richard Pipes, ed., op. cit., pp. 76-77

<sup>⑤</sup> Ibid., pp. 77-81

，曾有一新的莊重評估。社論表示：「國際緊張的緩和加上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日益不穩，影響到階級力量的部署，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開創前所未有的機會。」<sup>①</sup>不久，蘇聯共黨理論家波諾馬瑞夫 (Boris Ponomarev) 在華沙共黨會議中表示：「和解的條件及資本主義的普遍危機，為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義大利和法國的左派勢力，提供了特別的機會。此時，我們認為共黨較過去有更多的機會與資源，來影響歐洲的事件過程。」<sup>②</sup>

從經濟的層面看，蘇聯與西歐國家的和解，主要是希望從這些國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當初列寧之提出和平共存的策略，也是針對蘇聯落後的經濟而發。另一方面，蘇聯為了努力促使西歐國家對蘇聯集團的依賴，蘇聯採取下列措施：(1) 增進經互會的負債額。(2) 控制西歐能源供應。(3) 促進東西歐商業公司的合作安排。在蘇聯與西歐的經濟關係方面，蘇聯時常強調長程的安排，如此可以有效地將西方的經濟，依附於蘇聯的經濟計劃之中。<sup>③</sup>

儘管蘇聯熱衷與西方和解，但蘇聯並不因此放棄其共黨革命的世界目標，當一九七二年莫斯科高峯會後，蘇斯洛夫 (Suslov) 即撰文表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鬭爭非常尖銳，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無任何和平共存。」<sup>④</sup>兩個星期後，「真理報」一篇有關「意識形態工作」的社論表示：「和平共存並不代表兩個制度階級鬭爭的中止，只是在鬭爭中拒絕使用軍事手段。」<sup>⑤</sup>

#### 四、蘇聯與西歐共黨

雖然西歐共黨一再標榜脫離莫斯科束縛的獨立路線，但蘇聯自一九七六年東柏林共黨會議以來，對西歐共黨一直採忍受的態度，蘇聯即使展開反擊，其對象也以個人為主，避免對整個黨展開攻擊<sup>⑥</sup>。

蘇聯之所以不願意與西歐共黨公開決裂，主要因為蘇聯在這些工業上已開發的民主國家內部，擁有下列三種重要利益：

- (1) 在這些國家親蘇共黨革命的奪取政權過程中，蘇聯擁有潛在、平常的利益；
- (2) 在影響這些國家外交與國防政策，並使北約及美日聯盟削弱方面，蘇聯擁有現行、主要的利益，

<sup>①</sup> Pravda, June 5, 1974

<sup>②</sup> Pravda, October 18, 1974

<sup>③</sup> Richard Pipes ed., P. 24

<sup>④</sup> Izvestia, June 21, 1972

<sup>⑤</sup> Pravda, July 8, 1972

<sup>⑥</sup> 過去幾年來，蘇聯對西歐共黨領袖的攻擊前頭主要指向西班牙共黨領袖卡瑞洛與阿茲卡拉地 (Manuel Azcarate)，以及法共歷史學者 Ellenstein。參考 Richard Lowenthal, "Moscow and the Eurocommunists", op. cit., P. 48

(3) 在先進工業國家內，非執政的共黨能在某種程度內，對蘇聯及東歐共黨內部統治的合法性作出貢獻這方面，蘇聯獲有永久的利益<sup>⑦</sup>。

基於上述利益的考慮，蘇聯覺得它與西歐共黨雖有若干歧見，但西歐共黨仍是蘇聯外交及其他方面的支持者，何況，與西歐共黨完全絕裂會對蘇聯集團政權內部的合法性，造成嚴重傷害。

總之，共黨在法國或義大利等西歐政府的存在，對蘇聯而言，是享有最終的巨大利益的。至少，北約的安全將受到威脅，而蘇聯也易於獲取西方的重要情報。此外，最重要的是，共黨在西方政府分享權力的結果，將提供蘇聯更多及更佳的機會，以影響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這種政策，即一般所謂之「芬蘭化」<sup>⑧</sup>。

西歐共黨對蘇聯存在的價值，應該使西歐國家提高警覺。對西歐現政府來說，共黨的反蘇言論愈激烈，其在國內吸引的選票可能愈多，而其分享甚至執政的可能性也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西歐共黨獲取政權後，其在國內所欲達成的目標，與其競選時標榜的「民主」原則，可能相互矛盾。

## 伍、結 論

就當前的國際情勢來看，蘇聯在西歐進行芬蘭化的政策，已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在蘇聯執行此一政策的過程中，對蘇聯有利的因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 具有高度物質文明的西方世界，却在精神武裝方面日趨鬆懈。對此，肯楠有其極為中肯與動人的論說，肯楠認為，如果西方國家的「芬蘭化」發生的話，那是因為西方本身懦弱的結果，並非蘇聯的力量造成，肯楠形容可憐的，古老的西方，正一天衰弱地屈從於本身的頹廢，無力地陷入自我縱容及自我寬恕的泥濘之中。其中包括西方的吸毒、犯罪、色情、青年的放縱、耽溺於肉體的享受、過分的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等弱點。因此，西方在蘇聯的威脅下戰慄着，將蘇聯描繪成巨人，並誤認蘇聯已解決本身的問題，目前除毀滅西歐外，似乎別無顧慮。肯楠認為西方的此一想法，顯然是將危險的感覺具體化，而表現出失敗主義的徵候<sup>⑨</sup>。

<sup>⑦</sup> Ibid., P. 39

<sup>⑧</sup> Leonard Schapiro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communism", Conflict Studies, No. 99, September 1978, P. 15.

<sup>⑨</sup> George F. Kennan, "Are All Russians Feet Tall and Is The West Blinded to The Threat from Within? Freedom At Issue, No. 37 (September-October, 1976), P. 16 Quoted in Alvin E. Rubinstein, "Soviet Policy in Europe,"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77, P. 107

(2) 蘇聯近年來在歐洲的駐軍，已打破北約與華沙組織的軍力平衡，蘇聯並且積極現代化其武器裝備。與蘇聯的軍備擴張相比，美國在全球性的戰略態勢下，却表現出畏縮的姿態。特別是越戰以後，美國對參預海外地面作戰的意志已大為削弱。儘管西歐仍屬美國外交主要利益，但西歐國家對於美國的領導能力已表示懷疑，對於西歐遭到攻擊時，美國是否會採與蘇聯軍事對抗的意願，不具有信心。西歐甚至擔心，當美國與蘇聯和解時，是否會出賣西歐的利益。西歐的憂慮已表現在對美蘇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關切問題上。

(3) 在經濟與對外政策方面，美國與西歐時生齟齬。舉例而言，美國與西德的貿易是巨額赤字，美國希望西德採刺激經濟的作法，增加對美國產品的輸入，而西德則要求美國保護美元的下跌趨勢，並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在對外關係方面，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時，美與西歐對以色列與阿拉伯的爭執，採取不同的立場。此外，美與法國就核子擴散問題方面，亦有不同的看法。這些歧見都有可能導致大西洋聯盟的分裂，為蘇聯製造分化西方的機會。

(4) 儘管歐洲議會的直接選舉，歐洲貨幣的統一，以及歐市成員的擴大，是西歐趨向統一的重要步驟。但西歐社會目前面臨的經濟與政治難題，仍舊使西歐的統一，面臨許多阻力。在經濟方面，西歐各別國家的經濟現況不同，普遍的危機是失業與通貨膨脹；在政治方面，西歐缺乏一個共同的陣線，對西歐共黨，也因主觀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立場。此外，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也使西歐國家難以完成一個統一的願望。雖然西歐統一是一西歐國家一個可欲的長程目標，但西方觀察家認為，西歐目前仍「無意於統一的實現」<sup>(9)</sup>。

上述西歐存在的弱點，使蘇聯在較少阻礙的情況下，可以繼續其使西歐芬蘭化的政策。對西歐而言，芬蘭的例子應該提供一項嚴重的警告，但西歐國家的領袖似不甚注意。實際上，從芬蘭化到東歐的附庸形態，其中的路程是很短的。西方國家應了解，芬蘭化並非是蘇聯的最後目標，蘇聯的最終目標是在西歐實施共黨革命，在這方面，蘇聯駐芬蘭大使說的明白：「芬蘭是歐洲、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把權力移交無產階級手中的已發展、由資產階級民主統治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全世界共產黨及無產階級重視芬蘭及芬蘭共黨的原因，而芬共則是此一發展的關鍵所在。」<sup>(10)</sup>

既然蘇聯的陰謀已如此明白地呈現於世人面前，則西歐國家應在政治、軍事與經濟方面結合成一堅強的堡壘。作為自由世界的領導國家，美國亦應幫助西歐達成統一與團結。因為，一個統一團結的西歐，乃是符合美國乃至自由世界的利益。

<sup>(9)</sup> Mario Rossi, "Western Europe: still no will to unit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anuary 10, 1979 see also *The Japan Times*, January 9, 1979

<sup>(10)</sup> Punasalo, op. cit., p. 13